



摘取她器官的指令来自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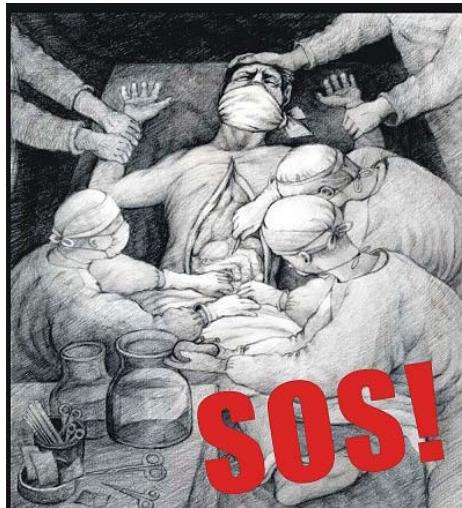
最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的报告震惊了世界。在这篇不长的报告里，有许多珍贵的真实信息。诸如摘取器官时不打麻药、过程中的现场教学、执行者的残忍，以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等。本文探讨的是摘取该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来源。

就这一案例来讲，是谁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呢？报告中没有谈及，但根据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运行机制和目击者所描述的情境推断，找出真正的幕后元凶并不难。

目击者说，“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来的人，一个是指派部门。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了。大家知道，军队和公安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公安的领导指派不了军队里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公安厅的某办公室能派来军医呢？显然，这中间有一个协调或者说是统筹的部门。

就辽宁省而言，公安厅是一个执法部门，它归属于辽宁省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不具备调动军队人员的权力，就更不要说公安厅了。公安厅指派军医来，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现有中共政治体制的机构才能协调运行。这个机构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就已经建立了，那就是中共的“六一零办公室”。

迫害十年来，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和判刑，无一例外都是各地“六一零”内定好了的。虽说大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和法院先拿出意见，但最终都是要经过“六一零”核准的。一旦“六一零”内定好的案件，无一例外都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审判，公开也好，秘密也好，都是一样的走形式。当然，地方“六一零”不具备将人内定处死的权限，但省级“六一零”的权限就大得多了。在最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称，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器官移植。大量证据指向，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中共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因不报姓名而被中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也大都由中共的军队所接管。而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中共中央“六一零”有此权限，何况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正任中共的军委主席。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是在中共的所有部门同时开展的，而负责协调和统筹迫害的正是这个非法的“六一零”办公室，它超越于中共的党政军系统而存在。中共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政策都是通过“六一零”这个独立部门传达下去的。

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器官摘取，这个指令可不是地方“六一零”所能决定得了的。特别是要将摘取器官者的器官用于移植，或作教学实验，以至于需要军队的军医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恐怕也只有相当级别的“六一零”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摘取这个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不是公安厅下达的，也不是军队下达的，而是辽宁省的“六一零办公室”。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来。

目击证人说，在军医的手术刀拉开法轮功学员的胸腔时，“她就嗷地

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

在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军医来摘取器官前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被摘取器官的人的真实状况，所以，当她大叫一声，并很清楚地说出理智的话语的时候，这两个军医“犹豫了一下”，并且“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军医这时已经明白他们要摘取的对象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军医来“执行”任务前，多半是不知内情的，顶多也只是被笼统地告知，那是个走火入魔的“×教”徒，或一个神智不清已没什么价值的精神病人，利用她的器官为社会造福之类的说辞。他们的“犹豫”和等待领导点头表态的过程，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军人和公安是如何在“六一零”的统一掌控下，协调地配合着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

那个“点了一个头”的领导，可能是公安厅的，也可能不是，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这名法轮功学员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的指令他是清楚的。当然，他也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他只是负责此案的执行，他完全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由直接目击者讲述了具体的摘取过程。世人只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辉煌成果，却不知那一个个器官后面极其悲惨凄绝的故事。而这一切罪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并且进行地是那样的旁若无人、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中共有一个超越现有党政军系统的“六一零办公室”。在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下，中共实质上早已把法轮功学员丢弃在器官移植的手术刀之下了。◇

毛利最大部落酋长：我 150% 地支持法轮功

新西兰海拔一百九十八公尺的伊甸山，是奥克兰市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顶可一览奥克兰全貌与壮阔海景，是重要景区之一，也是阿卡若纳酋长的部落区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日，新西兰最大的毛利联合部落酋长，七十七岁的亚马托·阿卡若纳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在两名友人的陪同下登上山顶。

他认真地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就其中的有关问题与法轮功学员和身边的朋友交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我的部落百分之一百地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支持法轮功。”

“我看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

当酋长得知去年十二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敢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

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游



■游客们入手一份法轮功传单与酋长交谈。人们一到山顶，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了声援法轮大法，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国大陆的游客们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其中三人当即退党。◇

大梁骨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

我是湖北省武穴市农村人，今年四十多岁。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医学奇迹。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早晨，我在广东一建筑工地打工时从四层楼高处掉了下来，当场摔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拍片检查，发现大梁骨（脊椎）摔得多处断裂，手术时在大梁骨两侧肋骨各上了六块约一寸多长、半寸多宽的钢板来支撑大梁骨。此外，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双手腕摔得骨头都凸了出来，额头摔得凹下去的面积约有两指宽，内脏也严重受创，抢救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

被当地医院抢救过来后，我由于大梁骨和额头等处受到致命伤，连续在急诊室被抢救治疗半个月，之后转普通病房继续插氧气治疗，前后住院三个多月，花了上十万元，还未治好，仍然不能起床，被人扶着下床，勉强拄双拐，拖着双脚一步一步挪地往前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医生见我伤成这个样子，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三年，即使不死也得终生残废。

出院后，因为自己不能起床，还得要专人护理。老板见我成了累赘，二零零二年腊月，就一次性给了我几万元将我打发了，叫人把我送回了老家。

回到家里，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人照顾，不时还要吃药打针治疗。眼看“坐吃山空”，工地老板付给我的赔偿金就要花光了，而我才刚到四十岁！天哪，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就在我心急如焚，打算了结残生时，二零零四年三月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看《转法轮》。我在一九九七年学过两天法轮功，见到过《转法轮》这本书，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只是后来外出打工就没再学了。我知道这梦是在告诉我：得法修炼才能得救。醒来后想，我要真能得到一本《转法轮》书该多好啊！可眼下正处在法轮功遭迫害的年月，我们这穷乡僻



壤，哪能请到《转法轮》啊，我真是望穿双眼！

终于，在零五年七月的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费尽周折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我弟弟也给我请来了一本《法轮佛法 大圆满法》，书内印有炼功动作图解。从这以后，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

刚开始炼功那阵，我还站不起来，走路只能拄双拐，一步一挪地往前移。因不能站立，炼功时只好靠着墙炼。大法真是神奇，刚看完一遍《转法轮》，人就感觉轻松多了，多年的“老烟瘾”，也很快戒掉了。学法炼功不久，奇迹在我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不到一个星期，我能站着炼功了！一个多月后，我彻底甩掉了拐杖，能够自己走了！

从这以后我对大法修炼的信心就更足了，我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事情做起，彻底改掉以前耍牌、赌博、吃喝玩乐和男女间不检点的浪荡习气，改邪归正，从做新人。

修炼两个月后，我大梁骨左右两侧的十二块钢板全都不翼而飞了！我的上身从此轻松了。开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呢。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憋不住了，到一家市立医院去拍片检查，结果发现旋在我大梁骨两侧的钢板真的全都没了！就连给我拍片的医生都大吃一惊，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

就在这期间，零五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当我炼第一套动功“握球拧掌”用力抻时，我双手手腕的骨折也好了。到了二零零六年正月，我双脚粉碎性骨折全好了，额头凹下去的部位也回复了原样。如今我身体已全部恢复正常，挑百多斤的重担都没问题。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象我这样一个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或“死缓”，就是不死也得终生残废的人，从得法修炼到完全康复，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这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竟然这么快就完全好了！每每回想起这段神奇的经历，我都禁不住泪水涟涟，发自内心感恩：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在大连教养院和沈阳教养院女二所遭受的酷刑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大连大法弟子，一九九六年喜得大法。原来身体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到医院看病吃药是家常便饭，自从得法后，各种病都没了，直到现在一粒药都没吃过。

九年“七·二零”以后，我多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大连教养院、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被残酷迫害，经历人无法想象的折磨。

在派出所遭背铐

二零零零年，我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警察把我双手背铐（一手从肩上往后背，一手从下面往后提，铐在一起），由于我胳膊短身体胖，被四个恶警一起用力才铐上，当时手铐卡进手腕的肉里，警察还拽着手铐把我提起来再打倒、提起来再打倒，直到我站立不住才松开，当时手肿的象面包。警察打我时，还把大法书拿来让我撕，把师父法像放在我脚下让我踩，都没得逞。警察又威胁说，要把我的孩子从学校带来，让他看着我被折磨。后来在大连看守所，我绝食抗议，警察将我手脚铐在一起，钉在木板床上灌食，食道被捅破，鲜血直流。我最后被非法劳教两年。

在大连教养院被吊铐折磨

在大连教养院，我和一批拒不妥协的大法弟子，被强制“转化”：弯腰九十度双手抱头一整夜。我被迫害的满身瘀疮、便血四天、发烧四十度，送到医院医生说这个人已经活不成了。教养院怕担责任，当天给我办了院外就医，中午让我家人把我接走。回家后，我通过学法炼功，恢复健康。

后来我去派出所追索被抄家时非法扣押的钱物，又被绑架送到了教养院。我拒绝背“三十条”监规，拒绝戴牌，被关进了小号（铁笼子）里迫害。警察把我的双手拉伸到极限后铐在铁笼子上，剧痛，豆粒大的汗珠从胳膊上渗出来，大小便失禁。三天三夜后，警察又指使普教（普通教养人员）把我一条腿绑在栏杆上，另一条腿劈成一字型，踢打下身、用拖布杆捅、绳子打结前后拉、抹辣椒水，



大陆大法弟子所遭受酷刑演示图

往眼睛里抹辣椒，往嘴里抹尿水，用木板抽打全身。我的脸被打走形，浑身没有正常皮肤，黑紫色，下身被打烂，腿被打瘸，双手扶着东西才能走，三个月后还不能正常走路。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又被绑架到大连教养院。我被绑在只有四条窄木板铁床四个角上，十八天后，每天又被罚站到下半夜一点，早五点起床，强迫超负荷奴役劳动，收工后继续罚站，站着站着睡着了，就被坐班（值班普犯）猛推一把或被谩骂。直到大连教养院二零零四年十月解体，又被送到沈阳马三家女子教养院女二所。

在马三家劳教所遭野蛮灌食、毒打和吊刑

在女二所，我被关押到严管队。严管队的每间监室关押十名大法弟子，监室窗户都用报纸糊住，只留几个小洞供警察在外面窥视大法弟子。经常听到走廊上有几个人的跑步声。有一次我看到四个恶警用女二所特制的有四个把手抬大蒜的大袋子，把大法弟子往外抬。第二天，五六个恶警冲进我们房间，没有任何理由的殴打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我被打得腰腿受伤倒地不起，恶警叫狱医进来给我检查，确认我起不来只能躺着，恶警崔弘还不让躺在床上，只能躺在地上。为了抗议非法迫害，监室大法弟子集体绝食，到了第六天，冲进来十几个警察，拿着开口器、木棍，不吃饭就被几个恶警打倒在地，骑在身上用开口器迫害，并用木棍往嘴里捅，直到吃饭为止。

二零零五年六月，被关押在严管队大法弟子集体绝食反迫害，我所在

监室大法弟子集体炼功。恶警又开始疯狂迫害，先是延迟就寝时间、几天不准洗漱，我找警察黄海燕讲真相，告诉她我们炼功是正当的，不让我们洗漱是不对的，我个人要绝食抗议。

七月一日，当我绝食到第五天时，几个恶警冲进监室，叫着我的名字，说我“反党”，用手铐把我铐起来，绑架到院里的警车上，送到女一所。同时送到女一所的还有大法弟子信淑华，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

女一所是关押普通教养人员的，每队六、七十人，其中关押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我不穿囚服，恶警赵国荣命令四、五个普教按住我，往身上套，两手被拽的抽搐不止。赵国荣叫普教把我铐在窗上，我喊“法轮大法好”，恶人就在我嘴上缠胶带。赵国荣命令普教把我早上拖到车间，晚上再拖回三楼监室。上楼时恶人拽着我的头发往上拖，头发一把把往下掉。我拒绝参加奴役劳动，恶警又把我铐在铁椅子上半个多月，两手抻开只能蹲着，早上六点铐到晚上十点。造成我严重脱肛、双腿不能行走，被两个普教扶着才能站起来。

在女一所，有一次我遇到了信淑华，恶警竟然扒光了信淑华的上下衣服，只留裤头。在沈阳冬天零下三十度的瑟瑟寒风里，信淑华双手搂着前胸，光着脚，被包夹在普教一列长长的队伍里，到了车间以后，又被捆绑着扔在厕所的水泥地上，恶警还把窗户打开冻她。真是只有人想不到的，没有马三家恶警做不出的流氓行径。

二零零六年七月，我又被送回女二所，拒绝奴役劳动，人高马大的男恶警刘勇对我拳打脚踢，暴打头部，我被打的鼻口流血、眼冒金星、耳朵轰轰直响，最后失去了意识，醒来后用手摸到自己的腿竟然不知道摸的是什么，好长一段时间失去记忆。后来又把我吊在二层床架上，使我站不起来又蹲不下，半夜十二点以后才被放下。我的脸已经被打的肿胀变形、青一块紫一块，他们叫我回监室，是让同监室人看看我的惨（转第四版）

古风悠悠：李母教子

唐代，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

李畲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有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量时不刮平斗斛，自然就多出来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回答说：“御史用车不付钱。”

李母生气了。她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畲。

李畲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事据《新唐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的坏事，是大恶的根源。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要在大堤之上，发现蚁穴，要从纷繁世事中，杜绝小恶，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了。

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量米



不刮平量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在现实生活中，中共的官员不就是从吃公款，坐公车，公私不分，进而把千万、亿万的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攫取到自己名下的吗？

社会腐败现象令人忧虑。从理论上说，如果人人都能像李母和她的儿子李畲那样，不放纵小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社会就会变得好一些。可惜的是，中共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对古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不能理解了。（文/陆真）◇

杏林漫步：吴越王钱镠治目疾

那只眼睛复明，但这样做就会减损你的福报。钱镠听后说：我不愿去世时依然是个独眼龙，你就尽管治吧，治好了我有重赏。

于是胡太医就为钱镠治病，使其复明。钱镠大喜，重重赏他价值五万缗的金、帛及各种宝物（注：一缗等于一千文钱），并派人用船将他送回后唐。当胡太医返回后唐首都洛阳后，钱镠就寿终去世了。（资料来源：《杨文公谈苑》）

这个故事中，真正使人惊奇的不是太医治好了钱镠的病，而是太医看到了钱镠的病如果不治，那他将会多活数年，如果治好了病则会减损福报，反而折寿。其实，从佛家理论也可以看出，人受苦是可以偿还人的罪业的，而过分地享福则会消耗人的福报。古代的许多中医是有特异功能的，能接触到另外的空间，看到那儿的真相，古代的中医真的是很神奇呀！（文/感恩）◇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南方的吴越国国王钱镠在晚年时，一只眼睛失明了，遍访吴越境内的医生也没治好。当时听说北方中原的后唐王朝有一位胡姓太医能治该病，就派人去请。当时石敬瑭还没有做皇帝，但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接到钱镠的请求后就派这位胡太医走海路到达吴越国，为钱镠治眼病。

胡太医仔细看过钱镠的病后，对钱镠说：您的眼疾如果不治的话，你可以多活六、七年，但如果一定要治疗的话，我可以为你治好，使您的

（接第三版）状，杀一儆百，恐吓其他大法弟子参加奴役劳动，当时监室的人看到我的样子都流泪了。第二天早饭后，我经过院子时，用全力高呼“法轮大法好”、“警察打人、执法犯法”，当时值班警察急忙来制止我。我问她：难道恶警可以把我打成这样，我连喊的权利都没有吗？警察不吱声了。

从二零零六年九月，马三家又开始对六十多名不妥协大法弟子进行所谓“攻坚”，每晚都能听到惨叫声。主要用吊刑，刑具是教养院上下双层铁床，把人上身从床头推进去，两手分别捆在上床两边，再把两条腿绑在一起，斜着固定在下床的铁架上，人的腰直不起来，蹲不下，整个人的重量全部在两只手腕上，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整天整夜这样吊着……，我被放下来时，手臂不能动，腰不能直，只能躺在地上。

信淑华被转回女二所后，被迫害的骨瘦如柴，还被灌了不明药物，必须有两个人搀扶着才能走动。在马三家女二所的院子里天天都能看到被折磨的不能正常行走的大法弟子。

我所经历的只是大连教养院和沈阳教养院女二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的一部份。

金州地区曾被关押在大连教养院部分大法弟子：

王日清、赵飞、王闯、老曹、陈辉、孙光红、范菊香、于长顺、刘清涛、赵桂琴、冯秀枝、张国立、张军、闫寿林、史红波、刘伟、孙秀军、李永滨、王春兰、洪茜、洪丽、曲庭跃、王兴田、陈海滨、韩学慧、刘希永、孙玉珍、毕XX等

金州地区曾被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的部分大法弟子：

包彩君、刘海荣、刘春英、秦玉兰、肖芳、周艳、赵飞、谭淑云、苏意文、赵桂琴、于少华、韩继玲、尹宝兰、方明、孙彬、张秀香、冯淑枝、候春黎、苗玉环、杨春媚、龙丽、王莲、丛金荣、王春兰、吕慧敏、苗丽敏、戚旭明、陈海滨、王桂英、周云英、杨丽霞等